

汉口赛马业税制研究(1928—1946)

祁金聪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汉口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城市之一, 同时也是内地较早引进近代西式赛马的城市。1928 年之前, 汉口历届政府对赛马的管理比较简单, 影响政府征税。1928 年起, 汉口市政府对赛马收入征税问题出台了一些规定, 并在后续数年间逐步完善。汉口市政府对汉口赛马业缴税的管理虽然取得一些成效, 但因为不能完全管辖英国人建立的西商赛马会, 其效果不足以维系赛马业生存。武汉沦陷后, 汉口赛马业迅速萧条。抗日战争胜利后, 汉口赛马业因经济基础在战时被破坏而停办, 战前制订的赛马税制随着赛马业衰落而消失。

关键词: 汉口; 赛马; 印花税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5)05-0089-09

收稿日期: 2025-09-26

作者简介: 祁金聪子(1999-), 男, 湖北武汉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6.009

中国古代因骑射文化、民俗节日已有赛马运动。1840 年后, 在华外国人将其母国的赛马运动带入中国, 并在一些城市仿效母国办法建立赛马场。这种产业化的赛马运动成本很高, 马匹培育、技术训练、赛场维护、骑手选拔等项都需要大量资金, 仅靠门票收入或地方筹集资金很难维持赛马业。^① 因此近代赛马业在体育赛事之外, 兼有博彩性质者不在少数。

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 赛马业基本是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开办。尽管清末的中外报纸会报道香港、上海、汉口等地的赛马活动, 但报道的主要内容仅为赛事场地、日期、出赛表等赛事信息。清政府对赛马业的管理鲜有记录, 原因在于当时中国人自办的跑马场很少, 外国人多在租界建设跑马场。清政府对外国人在华经营的赛马场几乎不能监管。1900 年后, 因竞争意识和盈利需要, 中国人自办的赛马场逐渐开始与外国人经营的赛马场竞争。政府也对赛马业的盈利行为加强监管, 赛马业交给政府的固定“报效费”在政府命令下演变为按收入比例抽税的赛马捐税制度。抗日战争胜利后, 赛马业因战争破坏已经十分萧条, 在民众呼声和政府禁令下, 中国内地的赛马业很快被取缔或自行消亡。由于历史背景比较特殊, 近代中国政府对赛马业的管理比较简单, 税收调整是最常见的管理方法。

“近代赛马运动需要在城市建造专业跑马场, 因此赛马业与城市经济发展、市民娱乐等因素存在密切联系。目前对于中国内地近代赛马业的研究已经包括东北三省、华北地区(天津)、华东地区(上海、青岛)、华中地区(汉口)。”^② 以汉口为对象的研究多关注赛马业对近代汉口社会的文化影响, 鲜有讨论其经济效益者。^③

已有成果多从跑马场建筑提供的公共领域与城市变化出发, 也有一些研究者从赛马这一运动的文化影

^① 本文中的“赛马业”一词, 如无解释, 均指近代带有博彩性质的赛马产业。

^② 相关研究成果如下: 汤锐:《赌博与慈善: 近代天津华商赛马会》,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0 期, 第 121-125 页。胡铁汉:《空间·城市·变迁: 近代青岛跑马场研究(1898—1949)》,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年。张宁:《礼帽与彩票: 上海滩的赛马与社会风貌》, 台北: 三民书局, 2024 年; 祁金聪子:《经济掠夺与文化入侵: 伪满洲国赛马业研究》, 《黑龙江社会科学》2025 年第 1 期, 第 127-135 页。

^③ 此类研究多与近代汉口城市文化、建筑相关: 姚星:《跑马场与近代汉口社会》,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年。姚星、龙涛:《跑马场与近代汉口消闲娱乐方式的转变》,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但海剑:《赛马在旧汉口传播的文化分析》, 《湖北社会科学》2010 年第 5 期。邓先海:《外国人与近代汉口的赛马活动》, 《武汉文博》2016 年第 1 期。刘雅君:《近代汉口跑马场的形成、演变及其对城市形态的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年。熊霞:《湖北民国时期的跑马场与市民社会》, 《社会科学动态》2018 年第 2 期。王汗吾:《武汉近现代赛马史究竟发端于哪一年》, 《武汉文史资料》2018 年第 1 期。侯红志:《老汉口三大跑马场的“起承转合”》, 《武汉学研究》2023 年第 1 辑。

响入手。但在近代赛马的经济活动属性上,未见有研究进行深挖。近代汉口赛马业对汉口城市文化影响深远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在民国时期一度创造很大经济效益又迅速衰落,说明仍存在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本文拟从赛马业税制出发,探究汉口历届政府对赛马业的态度及管理方式,兼论民国时期中国赛马业存在的问题。

一、清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初汉口赛马业概况

汉口是内地较早引进赛马的地区,至迟不晚于 1864 年。^①但彼时的赛马只是供少数人体验竞技体育的一种运动,兼有社交属性,尚不足以成为令一般民众狂热的大众娱乐活动,相关记录保存数量也比较少。经过几十年发展,20 世纪 20 年代的汉口赛马业重心已经从体育竞技活动为主变为经济活动为主。

1926 年的汉口已经建有三个跑马场。一是西商跑马场,全称为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简称西商赛马会,由英国人于 1905 年创办;在其创办时,英国人选择向香港总督府登记产权,此后亦长期歧视中国人。^②二是华商跑马场,全称为华商体育运动会,由以刘歆生为首的汉口商人于 1908 年合资兴建。三是万国跑马场,全称为万国体育运动会,系中西商界名人于 1926 年合资创办。^③三大跑马场除跑马外,也举办其他体育活动。华商跑马场在无比赛时可以免费入场游玩。

春秋两季是赛马的高峰期,每季赛 7 天,春季每日赛 10 场以上,秋季赛 6-7 场。每季还有决赛,称“香槟赛”。^④再加上义务赛和临时赛事,每年汉口要举行赛马 100 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比赛靠赛马博彩盈利。但清末民初历届政府对赛马博彩的管理基本没有形成正式规章制度。1905 年武汉开始对赛马业征收管理费,但并非以正式的税收名义:西商跑马场向政府缴纳比赛时期军警到场弹压的固定“报效费”,西商跑马场每日缴纳 400 元。华商跑马场和万国跑马场成立后按每日 300 元缴纳。1926 年统一为每日 400 元。^⑤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的汉口,三大跑马场齐开赛马,赛马博彩也随之盛行,西商跑马场在赛马上年入一度超过 20 万元。^⑥如何管理跑马场及其收入,是地方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因赛马博彩业影响社会风气,汉口政府官员一度想禁止赛马。1924 年,督军萧耀南曾指示保留春秋两季的赛马比赛,其余赛马活动一概以赌博为取缔。^⑦1928 年 10 月,汉口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主张禁止类似赌博的跑马,理由有二:其一为赛前各界人士休业赴跑马场,影响交通;其二为彩票欺骗行为。^⑧但在赛马纳税可以成为政府收入的前提下,完全取缔赛马并不现实。

此外,西商赛马会不轻易服从中国政府管理,也使得管理赛马业十分困难。西商跑马场规模大且冬季也开赛,骑手和马匹质量高,吸引了许多外国名人观赛和社交,在名气上远大于华商和万国跑马场。但因建于租界,西商跑马场在华商和万国跑马场建成后始允许华人进入^⑨,发生纠纷时则不太愿意服从中国政府管理。1928 年税务局搜查英商跑马总会,是因为收到消息称跑马场内有 1000 余瓶从上海运来的洋酒偷税。^⑩西商跑马场称有缴税收据,但税务局不承认。经湖北烟酒事务局调查,这批洋酒不贴印花,属于跑

①王汗吾:《武汉近现代赛马史究竟发端于哪一年》,《武汉文史资料》2018 年第 1 期。

②肖志华、施裕文:《旧汉口的跑马场》,《湖北文史》2003 年第 2 期。

③高长明编:《武汉市畜牧兽医志(1949—200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97 页。

④萧志华主编:《湖北社会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159 页。

⑤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财政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93 页。

⑥萧志华主编:《湖北社会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160 页。

⑦“[T]TUCHUN Hsiao Yao-nan has issued instructions to the Chief of Hankow Police to put certain restrictions upon the Chinese Race Club”,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864—1951)*, 1924. 5. 6, pp. 8.

⑧《汉市指委会主张禁止类似赌博之跑马》,《中央日报》1928 年 10 月 29 日,第 7 版。

⑨邓先海:《外国人与近代汉口的赛马活动》,《武汉文博》2016 年第 1 期。

⑩《汉口跑马总会内搜出大量偷税洋酒》,《中央日报》1928 年 10 月 25 日,第 3 版。

马场贩卖的商品。^① 英国领事又以《天津条约》为根据,坚称中国官员不应有搜查英国人房舍的权力,旋即被中方驳回。^② 西商跑马场见洋酒纠纷扩大,遂在缴纳赛马印花税 8340.37 元后,拒绝缴纳余下的 2594.03 元。^③ 经过中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华洋机制酒税分局前局长陈绍堂可能从中作弊,擅自开出这批洋酒的收据。关键的印花并非没贴,而是被焚毁。^④ 此事历时半年,最后中方以“维护中外关系”为名将洋酒归还,偷税行为并未深究。^⑤ 此次事件本为调查疑似经济犯罪,但西商跑马场联络英国驻汉口领事后,将赛马捐和不平等条约作为谈判筹码,使得事态扩大。南京国民政府为解决重大外交谈判的困难,不得不派员调解此次纠纷,汉口地方政府的权益被无视。

二、汉口地方政府对赛马税制的调整

赛马捐税比例问题是当时汉口三大跑马场面临的问题,在此问题上,过去历届政府一直以比较模糊的规定应对。但赛马业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展很快,作为一项给政府带来收入的重要经济活动,汉口地方政府规范其经营既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也能减少赛马赌博带来的社会问题。鉴于西商赛马会背后的英国势力,汉口市政府仅能以收税这一不容易触碰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办法尝试规范赛马业。

(一) 汉口市政府对赛马捐和印花税的调整

汉口赛马的捐税主要包括赛马捐和印花税两类。赛马捐和印花税在当时并行,且都经过调整。20 世纪 20 年代,汉口政府改过赛马捐比例,对赛马业担负的印花税进行了多次调整。《武汉市志·财政志》记录了 1928 年 11 月至 1929 年 1 月的财政统计数据,其中赛马业缴纳了两个税种:赛马捐 21008 元,赛马中彩所得捐 490 元。^⑥ 赛马捐系从马票面额上计算的税,发行马票时即需按比例扣除。赛马中彩所得捐系对中彩者所得的税收,范围很小。

1928 年底实行的赛马业印花税,是按照票面的 3% 粘贴印花,逐级递增至 5%,中马中彩所得捐删去。^⑦ 最低 3% 税率适用于收入 9 万元以下,每增加 2 万元收入,税率增加 0.5%,最高一级 5% 税率适用于收入 15 万元以上。^⑧ 跑马场经营者认为税率偏高,提出减免税负的请求。次年 1 月,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财政委员会指出印花税是国库大宗收入,政府财政紧张,即使是借用场地举行义务赛,也不能免除印花税。^⑨ 赛马业应缴纳的印花税规定为“一至十元贴印花一分,十元以上贴印花二分”。但在实际执行时是

①《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财政委员会指令 令湖北烟酒事务局呈一件奉令查办西商跑马会漏税私酒一案驳复英领经过情形拟定处理办法呈候示遵并声明英领请禁止将饮户税变为进口税一节断难承认等情由》(《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财政旬刊》(汉口)第 17 期,1928 年,第 36-41 页。

②《关于西商跑马会之洋酒案》,《财政旬刊》(汉口),1928 年,第 18 期。

③《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财政委员会公函(中华民国十八年一月八日) 湖北交涉署为西商跑马会扣留马票印花税款请查照函向英领事交涉由》,《财政旬刊》(汉口),1929 年,第 21 期。

④《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财政委员会指令(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令湖北烟酒事务局呈一件为西商跑马会漏税私酒案内遵令飭据华洋机制酒税分局查明前局长陈绍唐擅出收据特许不贴印花向无情弊等情转请核示由》,《财政旬刊》(汉口),1929 年,第 19 期。

⑤“Wine Seized By Old Regime Is Returned By New”, *The China Press*, 1928. 4. 28, pp. 1.

⑥《武汉市政委员会财政收入表(1928.11—1929.1)》,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财政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22 页。

⑦《武汉市市政府指令 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令财政局局长于垞咸 呈一件 为呈明办理赛马捐经过情形并缮具修改征收赛马捐守则请备案由》,《武汉市政公报》,1929 年,第 1 卷第 5 期。

⑧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税务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46 页。

⑨《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财政委员会指令 令湖北印花税局呈一件准武汉市社会局函转据建筑汉口新村筹备委员会呈拟借华商万国公共三跑马场各举行义务赛三天请豁免印花税一案应否照准请主持令遵由》,《财政旬刊》(汉口),1929 年,第 21 期。

按 5% 比例抽取。华商跑马场认为印花税负担过重，请求仿行上海征收市捐。^① 1929 年财政局给出新方案：按售票价值的 5% 征收赛马捐，中马中彩所得捐因故暂缓。^②

至此，困扰三大跑马场的赛马捐比例问题告一段落。但对于收缴的赛马捐如何分配，又经历了一次调整。财政局决定将赛马捐总额的一部分作为印花税，印花税的税率初为 3%，后改为 2.5%；余下钱款由财政局收入汉口特别市的市库。印花税局会计负责统计，财政局会计帮助审核，审核后印花税局和财政局各执一份支票。^③ 一份税金，统一收取，由两个机关分开。汉口特别市市长刘文岛在 1929 年 5 月所下命令也强调了印花税和市税是从跑马场收取的税额中对半分出。^④ 印花税局担负赛马期间跑马场的军警保护费。^⑤ 三大跑马场都按照这种方法缴税，减轻了跑马场在印花税上的管理成本。

印花税局和财政局平分赛马捐后，税款从征收到确认入库需要 20 至 30 天。根据财政局赛马捐会计专员唐允石和梁竹根的记录，因地点和时间不同，如遇到连续举办的赛马，则每日收捐，汇总后到一定日期后形成材料上报。下表是 1929 年 3 月部分比赛的赛马捐征收情况：

表 1 1929 年 3 月部分比赛赛马捐征收表^⑥

时间	地点	赛事名称	数额（元）
1929 年 3 月 2 日	华商跑马场	第十九次华商赛马	1083.42
1929 年 3 月 9 日	华商跑马场	第二十次华商赛马	1421.49
1929 年 3 月 16 日	西商跑马场	第二十一一次西商赛马	2049.39
1929 年 3 月 17 日	万国跑马场	未说明	2017.98

1929 年 4 月 21 日至 28 日（25 日无记录）未说明比赛地点，财政局共收到赛马捐 15828.14 元。^⑦ 平均每日收到税款 2261 元。1929 年 4 月至 1930 年 6 月，汉口特别市财政局在 11 个月里收到赛马捐共计 250553.03 元。其中包括两春一秋共三个大赛季。当时规定税率为 2.5%，并强调由财政局所属第一稽征处征收税款，各跑马场应提前上报赛马日，赛马日结束后将税款交给稽征处派出的稽征员。如有抗税行为，稽征员不仅收齐税款，还要对抗税者处以 10-20 倍罚金。^⑧

据时任湖北烟酒印花税局代理局长洪维清回忆，在其任职的两年（1930 年 9 月至 1932 年 12 月）间，汉口马票销售总额很大。^⑨ 万国跑马场每月开赛数次，每次都能卖出数万元马票，华商跑马场每次开赛也能销售一万元左右。在洪维清到任前，由跑马场买办和经理负责贴印花，每次贴数百元。洪维清到任后派出会计师核实贴印花情况。但因跑马前准备时间紧张，按马票贴花则手续繁琐，就改为凭每天销售马票日

①《武汉市市政委员会训令 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令财政局：华商赛马公会为陈明该会困难情形恳将马票印花税仿照上海市成例改充市捐乞察核示遵由》，《武汉市政公报》1929 年第 1 卷第 3 期。

②《酌减赛马捐额》，《武汉市政公报》第 1 卷第 2 期，1929 年。

③《呈请武汉特别市政府呈明奉谕变更赛马捐征收方法及赛马捐捐率业经遵办由（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汉口特别市财政局财政月刊》，1929 年，第 1 卷。

④《武汉特别市政府指令 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令财政局局长陈毅民、副局长任耀先 呈一件呈复征收赛马捐办法请鉴核示遵由 呈悉准如所拟办理此令》，《武汉特别市市政月刊》，1929 年，第 1 卷第 2 期。

⑤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第 5 辑 地方税及其他税捐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750 页。

⑥数据来源《汉口特别市财政局财政月刊》第 1 卷，1929 年，第 22 页。

⑦见《武汉特别市财政局指令：字第 号（十八年五月九日）：令赛马捐会计专员梁竹根，唐允石：呈一件呈解四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七、二十八等日赛马捐洋请核收给据由》和《武汉特别市财政局指令：字第 号（十八年五月九日）：令赛马捐会计专员梁竹根唐允石：呈一件呈解四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等日征获赛马捐洋请核收给据由》，《汉口特别市财政局财政月刊》第 1 卷，1929 年，第 93 页。

⑧《汉口特别市赛马捐征收暂行规则》，《汉市市政公报》，第 1 卷第 8 期。

⑨洪维清：《我与湖北烟酒印花税》，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经济金融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231 页。

计表将应贴印花打洞上交税局。跑马场的买办担任税局的分局长，凭实贴印花税数目给予 20％提成费。^①此做法使得汉口市政府在实际操作中直接接触马票销售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逃税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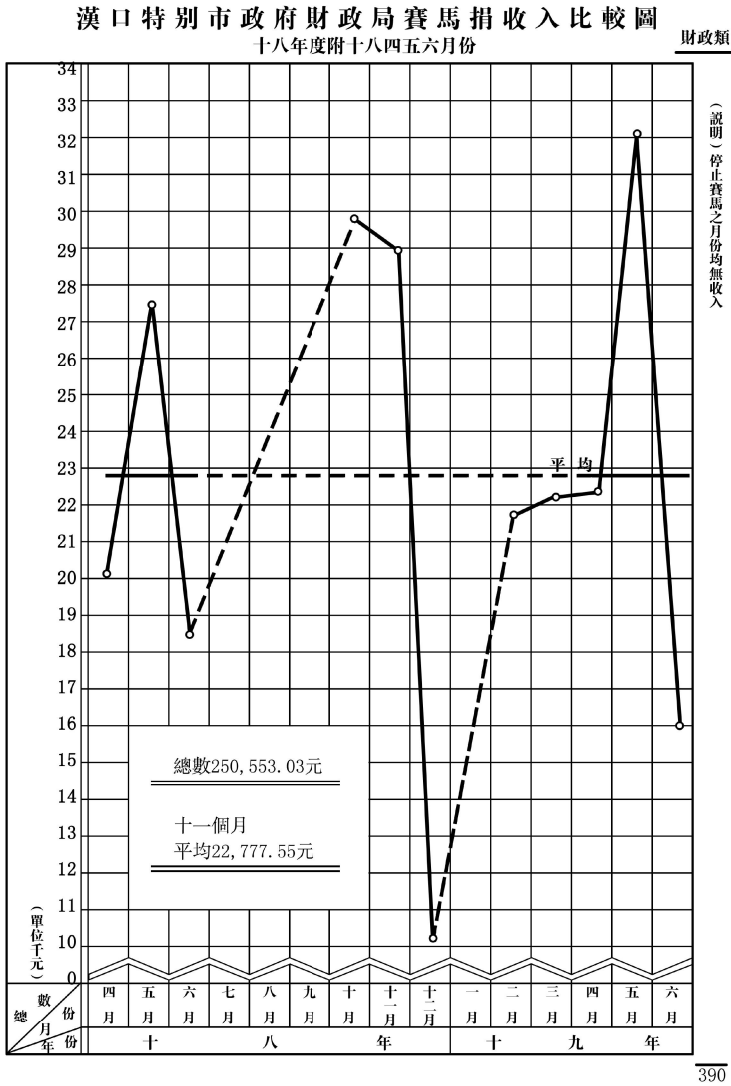


图 1 汉口特别市政府财政局赛马捐收入比较图^②

以后续两年赛马捐数据来看，上述缴税手续的规范对稳定税额有一定帮助。汉口市政府统计的赛马捐数据显示，1932 年征收 170314.43 元，1933 年征收 158977.17 元。^③ 其中 1933 年赛马捐的纯收入为 116832 元。^④

1933 年，湖北省政府出台了《汉口市税捐稽征处征收赛马捐暂行规则》（下文简称《规则》），共九条。《规则》规定无论中外国籍人士举行赛马，均缴税 2.5％；每日赛马结束后由驻场征收员统计金额和收取税

^① 洪维清：《我与湖北烟酒印花税》，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经济金融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240-241 页。

^② 《汉口特别市政府财政局赛马捐收入比较图》，《汉口特别市市政统计年刊民国十八年度》，1930 年，第 390 页。

^③ 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第 5 辑 地方税及其他税捐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751 页。

^④ 《汉口市政府 1933—1935 年度财政收入表》，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财政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44 页。

款;抗捐者罚 5 至 20 倍税金,瞒报捐额者罚 5 至 10 倍税金。^①《规则》确定了汉口市政府征收赛马捐的标准和方法,加强了汉口市政府对赛马业的管辖权力,比之前就事论事式下达命令有所进步,跑马场也很难找到借口拖欠或拒交赛马捐。《规则》规范了赛马捐的征收办法,但没有在印花税细则上多加说明。此后印花税的征收以行政令为准,也存在减免。如 1933 年 1 月财政部训令即令湖北印花烟酒税局免征华商赛马工会六日义务赛部分印花税,因这部分税款是支持中央党部之用。^②

至此,赛马捐的征收模式基本定型。汉口各跑马场除开展盈利赛事外,也办一些公益性比赛。汉口市政府对赛事审核后,可以免除公益赛的赛马捐。如 1929 年 5 月汉口贫民大工厂经费不足,申请在华商跑马场非赛事日加赛三日筹款,经汉口市政府备案、印花税局和武汉特别市社会局批准,没有征收赛马捐。^③又如 1929 年水案失业工友募款委员会申请三日义务赛免税,但此次义务赛收入需全部捐出。^④

(二) 赛马税制调整引发的的问题及应对

前文提到,西商跑马场建于租界,遇到与中国政府的纠纷,曾以抗捐和联络英国驻汉口领事为反制手段。1934 年汉口赛马印花税的再调整,又引发了一次类似的风波。

1934 年汉口市政府呈请湖北省政府将赛马印花税从 2.5% 提高至 4.5%,西商赛马会认为负担过重,请求依照上海市中国赛马会的规定,改为给马票贴“每五元加一分,每十元加二分”的印花。汉口市政府拒绝减税,西商赛马会遂拒绝缴税。此次西商赛马会要求减税,非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坚定了汉口市政府增税的决心,将此纠纷报给财政部。1934 年 9 月,财政部批复电文指出汉口市政府增加赛马税与印花税无关,且“马票印花税率另有规定”,要求在新马票印花税率规定下发前不得减税。^⑤赛马捐增至 4.5% 后,虽然因市面凋敝,赛马业无太大热度,但 1934 年实际收到赛马捐超过 21 万元。^⑥

西商赛马会向汉口市政府提意见未达到预期,遂联系了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署。英国驻汉口领事阿尔澈认为汉口市政府的加征,令赛马捐涨到 7%,其中 4.5% 归市政府,2.5% 归印花税局。加征后跑马场无余款付给汉口赛马马票印花税专员办事处。阿尔澈还提出应将征收权统一于一个机关下。^⑦西商跑马场将未缴纳的印花税款存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署,以此继续与汉口市政府对峙。汉口市政府以停赛为预备处理办法,但此事不断发酵,最终上报至国民政府财政部。一份带有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公章的档案显示,西商跑马场系将未缴印花税款“转存”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署,并非抗捐,因此停赛处分“暂缓”。^⑧

1935 年,财政部命令河北、山东、江苏、湖北四省的赛马业同缴一种印花税,计算方法为“每一元贴印花二分”,赛后计算总额并提出 10% 作为手续费。^⑨四省中只有湖北是将印花税和政府税收补助合并并在赛马捐中征收,政府税收补助原本用于在比赛时拨付军警保护费,此次命令将军警保护费一项取消。

①《汉口市税捐稽征处征收赛马捐暂行守则(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三次市政会议修正通过)》,《湖北省政府公报》,1933 年,第 22 期。

②《财政部训令:税字第 号(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令湖北印花烟酒税局据伤军实业工厂筹备处呈请免征义务赛马印花税等情碍难照准仰即录令转饬知照》,《财政日刊》,1933 年,第 1469 期。

③《武汉特别市财政局公函:函社会局准咨请免收汉口贫民大工厂赛马筹款捐税应照准由(十八年五月十五日)》,《汉口特别市财政局月刊》,1929 年,第 1 卷。

④《武汉特别市财政局训令:字第 号(十八年六月六日):令各区稽征处:令知水案募委会函请免征三日赛马捐已由秘书处复请巡印花税局商洽着即随同印花税局酌核办理由》,《汉口特别市财政局财政月刊》,1929 年,第 1 卷第 2 期。

⑤《财政部电湖北印花烟酒税局、汉口西商赛马会:为马票印花仍应照案缴纳不得减轻仰遵照由 十月十七日》,《税务公报》,1934 年,第 3 卷第 4 期。

⑥《汉口市政概况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年六月》,出版信息不详,财政第 3 页。

⑦《湖北省政府关于西商马会捐税照 5% 数目办理并指定机关核收的训令》(1935 年 3 月 25 日),档号 LS019-002-21930005,湖北省档案馆藏。

⑧《财政部关于汉口西商马会抗缴印花税准暂缓执行停赛处分的咨》(1935 年 5 月 7 日),档号 LS019-002-21930008,湖北省档案馆藏。

⑨《财政部训令 河北、山东、江苏、湖北印花烟酒税局:为印花税法业已施行各该省赛马票印花应遵照指示各节办理由 九月十八日》,《税务公报》,1935 年,第 4 卷第 3 期。

由此观之,赛马捐和印花税的调整只是初步的约束,基本保证赛马捐定时定量缴纳。税收的调整需要结合实际进行,且对英国人控制的西商跑马场效果一般。

三、汉口赛马业衰落期的赛马税制

经历了数年的调整,赛马捐的征收获得了初步规范,赛马捐成为汉口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但这种局面因日本侵华而迅速破碎。1938年武汉沦陷后,汉口赛马活动迅速走向衰落:华商、西商跑马场基本停办,万国跑马场赛事大减。赛马业在1940年“中日合办”后,仅跑了几次比赛便因战争陷于停滞。

1940年9月,掌管赛马场的日军当局出于选拔军马和吸引民众注意力的目的,批准恢复赛马。日伪政府将万国跑马场变为中日合办,任用伪汉口特别市市长高伯勋为万国赛马会会长,意在宣传“中日亲善”。赛马所得优先作为伪政府的收入,余额作为博彩吸引民众。^①仅存的万国跑马场在日军的控制下,垄断了武汉赛马业。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爆发,日军迅速解散了英国人控制的董事会,并全部以日本人代之。^②万国跑马场划分了股份,伪汉口市政府认购1800股,日方认购1120股,华商仅有130股。伪省政府改定税率为4%。^③万国跑马场已经完全变成日军敛财的工具。1943年,日本在汉口又组建中日联合公司管理赛马业,总资本500万美元。^④原本赛事颇多的西商跑马场,在1941年日本接管后只办了两次赛马,便被改为高射炮阵地,战后又成为遣返日军战俘的集中营。^⑤总之,受战事影响,赛马业已经无法恢复日军侵华前的人气。

抗日战争胜利后,赛马业一度停办。1946年2月,万国跑马场呈准恢复赛马。此时汉口市政府按照娱乐税办法,赛马捐按门票征收50%。后因门票收入有限,又加征每日营业奖金收入的20%。^⑥1946年7月,万国跑马场的马票起价为1000元,售价的50%上缴政府作为税收,赛马场方收20%,购买者实际所得仅有30%。《大公报》社论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武汉率先恢复赛马,税收去向不明,徒增赌博坏风气。^⑦“赛马捐”这一名词几乎无人提及。仅一个月后,万国跑马场被废止,没有再办大规模赛马活动。同年,国民政府监察院明令禁止经营赛马场,汉口三大跑马场全部停办赛马。^⑧

由此可见,汉口赛马业依赖于它的经济属性,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赛马业生机勃勃;社会经济受到冲击,则赛马业迅速衰落。赛马捐作为政府收入之一,在赛马业衰落的同时也消失了。

四、无法可依:从汉口赛马税制管理透视近代中国赛马业

汉口的赛马运动在内地发源甚早,具有很强的代表性。1928年至1937年间,赛马业凭借运动竞技价值和博彩吸引了大量财富,深刻影响了武汉的城市面貌和文化。1937年后汉口赛马业长期受战争影响,一直不景气,1946年最终停办。汉口赛马业有较长的历史和较大的规模,但抗日战争后汉口赛马业很快衰落。这种衰落既是因为禁令,更是因为管理者对赛马业长期的不善管理:只凭缴税手段做不到规范赛马业经营。表面繁荣的赛马业早已埋下毁灭的种子。

汉口赛马业缺乏法律依据的理由并不复杂:赌马的高额利润既是观众热衷赛马的理由,也是汉口历届政府允许赛马的原因之一。早期的汉口赛马业管理是明显的利益驱动管理。跑马场从经济活动中获利,政

①涂文学、刘庆平主编:《武汉沦陷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45页。

②邓先海:《外国人与近代汉口的赛马活动》,《武汉文博》2016年第1期。

③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财政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4页。

④“HORSE RACING BODY FORMED IN HANKOW”, *The Shanghai Times*, 1943.5.20, pp. 6.

⑤童仲屏:《大赌场—汉口西商赛马会》,《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1期。

⑥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财政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4页。

⑦《汉跑马场竞复业 票价一半归市府用途不明 购者得标实得仅十分之三》,《大公报》(重庆)1946年7月2日,第2版。

⑧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财政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4页。

府通过收“报效费”保护赛事安全。1928年赛马捐和印花税调整后，政府的管理逐步加强，税收日趋稳定，但政府没有为赛马业出台专门法规，只是以行政性质命令调节赛马税制。赛马业者感到利益受损，即主动申请减税，再由政府出台新的行政令。但政府和跑马场的沟通并非每次都很顺利，减税申请往往需要数月审核，期间发生的个别抗捐事件也说明管理问题明显。西商赛马会经营能力最强，但其背后是英国在华势力，汉口市政府无力与之对抗，其经营活动中的弊病自然无法解决。因此。总之，汉口赛马税制并不构成完整体系，制定决策者的主观意愿与赛马活动实际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

事实上，中国近代开放赛马博彩的几座城市，如武汉、上海、天津、青岛，对赛马业的管理都比较粗放，且重心偏向于保障政府从赛马业获得稳定收入。此外，赛马业因其赌博性质，存在不公开之处，也常涉及一些官商交易。有些官僚要求或暗示赛马业向政府交钱或发香檳票，实为政府的灰色收入。^①政府在获取利益时，是以“交易”而非“产业”来衡量赛马业，并没有规划赛马业长期发展所需的物质准备和制度准备。

造成近代中国赛马业缺乏有效制度保障的原因如下：

首先，缺乏系统化管理。部分跑马场设在租界或者实际控制权在外国人手中，中国法律推行困难，如汉口西商跑马场由英国人管理，在1928年汉口西商跑马场洋酒案中，税务局搜查英商跑马总会便险些引起外交纠纷。赛马捐是财政事务，全国各地缴纳方式和标准不一，如要立法，需要各地统一。赛马业以博彩为主要收入，社会评价“开”和“禁”两极分化；政府对赛马业的管理突出利益因素，当赛马业提供大量税款时允许开办，当赛马业不景气时就以破坏社会风气为理由停办。

其次，赛马运动经济价值与其他价值之间缺少平衡。中国近代赛马业主要满足观众的观赏和赌博需求，忽视了赛马作为一种培训人与动物共同参与的竞技体育的专业性。在发展初期，因跑马场多建于租界，只有少数外国人关注赛马规则。待到赌马盛行之时，在赌博心理的影响下，观众只会关注赛马名次和马票面额。赛马在经济价值上和其他赌博活动接近，远离本来的体育娱乐价值。

以同在19世纪引入西方近代赛马的日本为例，早在1907年（明治40年），《競馬大鑑》一书就详细介绍日本赛马标准、日本赛马史、比赛类型和赌马规则等信息。^②1923年（大正12年），日本农商务省首次颁布赛马法施行规则，对赛马业的规则、场地、马票发售做了详细规定。^③此后赛马法被多次修改，直到1937年，半官方的日本赛马会成立。日本侵华期间，还曾在“伪满洲国”颁布赛马法，其中规定了赛马所得收入由政府管理，用于马匹改良和繁育，多余收入则用作畜牧事业和社会事业。^④这些条文借鉴了日本本土赛马的管理方法；赛马业归于畜牧业，赛马的主要目的是繁育优秀马匹用作军马。但武汉沦陷后，日军并未发布类似规章，只是在1941年以日本人替换英国管理人员，并控制赛马业经营权。

在赛马制度上，日本早已有官民合作的赛马运行机制，有固定的牧场繁育和训练马匹。1948年，日本颁布新的赛马法，确立国营赛马（中央赛马）和地方赛马两个体系。两大体系经过数十年经营，至今已具备相当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中国近代赛马的赛制只是简单模仿西方赛制，赛马税收制度与比赛制度联系不紧密。政府对获利的兴趣远比协助发展赛马产业要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国资本虽然试图在汉口恢复赛马，但社会舆论对赛马业的负面评价较多，汉口市政府也没有支持马产业的政策。汉口停办赛马后，《诚报》刊登过一些与赛马有关的文章讨论马产业。^⑤1949年武汉解放，西商跑马场从英国人手中交还

①《大香檳票头二三奖得主提名》，《汉口新闻报》1933年6月13日，新闻第三张第五版。

②『競馬大鑑』、东京：竞马杂志社、明治40年9月、国立国会图书馆：<https://ndlonline.ndl.go.jp/#!/detail/R3000000001-I000000492942-00>，发布时间不详。访问时间：2024年9月5日。

③官报第3274号、1923年06月29日（大藏省印刷局编日本マイク口写真，大正12年），总第726页、国立国会图书馆：<https://ndlonline.ndl.go.jp/#!/detail/R3000000003-I2955397-00>。访问时间：2024年9月5日。

④《赛马法（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满洲国政府”公布。文献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网址：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1&showType=1&indexName=data_462&fid=h-016033，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7日。

⑤参见以下报道：《谈赛马》，《诚报》（汉口）1947年8月20日，第2版。《日薄天寒动刀动枪 刀口吮血大胆钱庄 要请救济先服毒 赌博赛马餐强梁》，《诚报》（汉口）1947年12月27日，第4版。

给中国人民，华商、万国两个跑马场彻底关闭。^① 近代汉口赛马业彻底结束，但大量文献留存及 1949 年后收集的亲历者口述材料使得这些历史得以保存。

综上，中国近代赛马是在外国人引入的赛马体育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大众娱乐性竞赛，专业性不足，根本目的是获利。既缺乏政府的管理，也没有发展成为独立产业的能力。虽然有时会介入慈善事业，但赛马博彩对一般民众财富的“吸血”，令社会舆论难以接纳赛马业。赛马虽然为建有跑马场的城市提供了异于传统体育活动的享受，跑马场作为公共领域也确实影响了城市的发展格局，但最终还是要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结 语

随着中国本土赛马事业的发展，赛马的经济及娱乐价值逐渐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近代赛马运动在中国的历史同样得到研究。汉口赛马业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一度为从业者和政府提供了可观的收入，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的城市文化。

作为商业性质的速度赛马，其经济利益为从业者最优先考虑的对象。汉口市政府对赛马业的管理，其前提也是保护自身收入。民众观看赛马的集体行为与赛马运动的体育属性缺乏联系，许多观众仅为购买彩票而前往跑马场。虽然华商跑马场在无赛事时会举办一般性体育活动，以宣传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但此举不具备长期社会影响。赛马运动的专业性和高额费用决定了近代汉口赛马作为体育运动不太可能长期存在，且必然转为经济活动。发行具备盈利性质的赛马彩票自然成为首选。近代汉口赛马业从发展到衰落的历程说明一个问题：在一项社会影响力大、经济效益较为明显的活动中，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模式，以规范活动主体及参与者。但在民国时期的汉口，因西商赛马会及其背后的外国在华势力阻碍，加之政府仅重视经济效益，使得赛马活动的利益成为核心要素，其体育属性被淡化。抗日战争胜利后，汉口经济亟待恢复，社会反对赛马呼声再起，这些因素的合力导致汉口赛马业迅速消失。

Research on the Taxation System of Hankou Horse Racing Industry (1928—1946)

QI Jin-cong-zi

(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Hankou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ities in modern China to open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lso one of the earliest cities in China's mainland to introduce modern Western style horse racing. Before 1928, the management of horse racing by successive governments in Hankou was relatively simple, which affected government taxation. Since 1928, the Hankou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issued some regulations on the taxation of horse racing income, which were gradually improved in the following years. Although Hankou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achieved some success in the management of tax payment of Hankou horse racing industry, its effect is not enough to maintain the survival of the horse racing industry because it cannot fully control the Western style horse racing club established by the British. After the fall of Wuhan, the horse racing industry in Hankou rapidly declined.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horse racing industry in Hankou was suspended due to the destruction of its economic foundation during the war, and the pre war horse racing tax system disappeared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horse racing industry.

Keywords: Hankou; Horse racing; stamp duty

[责任编辑 山阳]

^① 萧志华主编：《湖北社会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161 页。